

寻求理路的思想事业*

——读《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

梁议众

【提要】《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汇集了叶秀山先生三十年来研究康德哲学的代表性论文。叶秀山分析了康德各个具体的思想和康德哲学整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且超出康德哲学,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揭示了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和康德哲学在理路上的贯通。在这些研究中,叶秀山不仅实现了文本研读和义理贯通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的问题和论证已经转化为叶秀山进行哲学思考的资源。对康德哲学理路的揭示与展开同时包含着叶秀山自己的哲学思考。所以,叶秀山的康德研究并非只是一种专业性工作,同时也是寻求理路的思想事业。

【关键词】 启蒙与自由 康德 理性 判断力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14)03-0034-06

在今天,从研究文献的数量统计来看,康德仍是最受关注的哲学家。我国最早介绍康德思想的是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引领一代风气的思想家。郑昕先生则是第一个对康德哲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不过,他的工作还局限于康德的知识论方面。^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康德哲学研究开始恢复与深入。康德著作有了多个新的译本,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郑昕之后的老一辈学者中,真正从哲学角度深入、全面地思考康德哲学问题并有所融通与突破的,叶秀山先生无疑是少数几个名家之一。

《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汇集了叶秀山先生对康德哲学的主要思考。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康德哲学专论”,收入论文15篇,着

34

重探讨了康德哲学中的“启蒙”、“理性批判”、“自由意志”、“判断力”及“目的论”等重要问题;第二部分是“哲学史上的康德”,收录论文9篇,结合黑格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和德勒兹等哲学家对康德式问题的推进和转化来审视康德哲学的意义和现代价值。

叶先生对从前苏格拉底到后现代的西方哲学都有专门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但人们未必知道,叶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从康德哲学起步的,其学术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1954年,时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项目“理性的冲突与统一——康德的先验辩证论研究”(编号:2013M530840)的成果。

① 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0~104页。

为北大学子的叶秀山在郑昕教授指导下做毕业论文，选的题目就是康德哲学。叶先生正是由于这篇毕业论文，受到贺麟先生的青睐，得以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后来的二十余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境况更加艰难，然而哲学所内大师云集，叶先生受到这些前辈的熏陶，又何其幸运。他日夕以书为伴，学术兴趣从康德到黑格尔而至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构成了叶先生思考的背景，因此，也可以说贯穿叶先生研究生涯的是康德哲学。收录在本书中的论文《康德的先验宇宙论的二律背反》写于1981年，《论美学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写于1983年，这正是叶先生潜心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阶段。在《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一书中，^①叶先生在分析卡西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杜弗朗（M. Dufrenne，又译为杜夫海纳）等人的思想时对康德的思想多有涉及，详加引申，胜义叠出，有心的读者都能从中看出在作者思考中的康德身影。实际上，对现代欧陆哲学史的研究若没有康德哲学的基础，的确是很难想象的。哲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笛卡尔启其端，然而到康德方始真正完成。这倒不是说任何哲学家都要通过康德哲学方能建构自己的理论，而是说康德哲学的问题域与超验哲学方法影响了现代哲学的主流（这个主流甚至涵盖了英美现代哲学）。以这个主流为背景，一些思想家之奇、之异、之新才能凸现出来。以康德哲学为坐标，往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现代诸家理论的取向和异同，从而给出恰当的定位。

叶先生的西方哲学研究一方面以康德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为支点，另一方面，他对古希腊到后现代诸家的研究又使自己的康德研究有历史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这使他更重视的是揭示与讨论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试图创造性地解释康德，从而推进对康德哲学问题的新理解与新讨论。

康德的书难读，读叶先生的书亦非易事。

比起以往，可以说现在的论文更难理解了。长期以来，康德研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大致来说，一种可说是学者的康德研究，一种可说是哲学家的康德研究。前一种是对康德哲学的注疏，研究所重的是“康德哲学是什么”；后一种则是对康德哲学的创造性重构，在解释中提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所重的是“康德哲学应当是什么”。按这个区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叶先生的论文主要是学者的康德研究。叶先生参考了温德尔班、斯密（N. K. Smith）、卡西尔（H. W. Cassirer）、左黑尔（R. Zocher）等专家的成果，就康德哲学的某个问题，展开论述。自《思·史·诗》之后，叶先生的问题意识逐步增强，越来越重视对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本身的研究，不过，叶先生所思所论的不只是康德文本中的问题，也是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德勒兹等原创性哲学家提出的康德式问题。这使此后的论文与前期大不相同。叶先生少用引文，也少参考专门的康德研究文献，行文打满了引号。熟知非真知，叶先生要在大家熟知的东西上，常看的经典文本中提出新问题，发挥出新思想。常见的概念经叶先生阐发有了全新的含义，往往有令人豁然贯通之感。

将这部论文集命名为《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包含了作者对康德哲学的一种独特解释。康德哲学本身是启蒙运动成果之一，但是从纯粹哲学角度说明“什么是启蒙”的是康德。启蒙的真义在于回归理性自身的自主性。启蒙不是获致某种知识，而是回归以理性自身的标准为标准。真正的启蒙就是要使人的理性在应用中实现自我定向、自我引导和自我约束，首先需要的就是摆脱受监护的状态，逐步学会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性。所谓“自己思维就叫做在自己本身中（也就是说，在其自己的理性中）寻找真理的至上试金石；而在任何时候都自己思维的准则就是启蒙”。^②康德的远见卓识在于

① 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德]康德：《康德全集》第8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指出,启蒙的动力和目的都在于理性自身,否则启蒙不是走向狂热和迷信,就是重新回到宗教、政治和思想的专制状态。这种回归理性自身,就是回归自由。所以,叶先生写道:“自由”即是“自己”。“启蒙”精神乃是“理性”之精神,“自己”之精神,“自由”之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①如此解释,简明扼要,深得康德启蒙之真精神。

不过,在当下理性已变成一个可以任意解释、嘲讽的概念,也就很有必要认真问一下“什么是理性”。所以,康德有关理性的批判与划界的工作这几年一再引起叶先生的关注和讨论。康德批判哲学的工作就是对理性的审视,厘定理性具体的权限与范围,以使理性的每一种能力都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与范围,借此,康德确立起了一个关于理性之二元运用的理性观:理性有理论的应用与实践的应用,后者不仅不能还原为前者,而且优先于前者。叶先生从区分知性与理性的立法功能角度来阐释康德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分:“知性”为“在时空中者”“立法”,给“自然”以“规定”;“理性”为“超时空者”“立法”,给“自由”以“规定”。这就是说,“理性”在“实践”上为“(意志)自由”“立法”,给“自由”以“规定”,一如“知性”在“理论”上为“自然”“立法”——给“自然”以“规定”。“受时空限制者”在“理论”上为“必然”;“不受时空限制者”在“实践”上为“自由”,前者是为“知性”“建立—建构”的“科学知识王国”,后者是为“理性”“建立—建构”的“道德实践王国”。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并非“无法无天”,“不受时空限制者”不是“天马行空”,相反,这些“无限者—不受限制者”只是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而是“遵循”“理性”为“自己—自由”所立之“法”“行事—实践”,“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乃是“法”的最高意义。^②作者很少直接回应康德受到的种种批评,然而事实上为康德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当代一些学者把一种非常偏狭的理性观强加给康德然后批评之,另一些人则惑于康德理论的诸多层次,

由此提出风马牛不相及的批评。读了叶先生这些论述,一些对康德理性观的疑虑和批评涣然冰解。

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认为,理性自身具有的形式是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先天的形式不是天赋观念,也不是知识的现成材料,而是在认识过程中规定后天质料,从而构成知识的在先条件。所以,形式的这种先天性是指形式是理性自身具有的,从否定方面说,就是形式不是来自经验的概括、抽象,它不能还原为感觉经验。要理解康德的这一思路就必须区分认识的发生学分析和对认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的先验分析,前者是心理学、科学的分析,而后者则是哲学的工作。这种区分在康德哲学中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最容易遭误解的地方。所以,叶先生着意给出了透彻的论述:“理性”的“超时空”性,意味着它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哲学的本源意义上并无“经验起源”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固然可以问:人类的意识如何起源并如何“进化”到“理性思维”的程度,这是经验的人类学合理的“意识起源”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在“哲学”的合理的“事业—视野”范围之内,犹如哲学并不具体研究“人”和“物种”的“起源”那样,按照康德思路,“哲学”——他的“批判哲学”探讨“经验”“何以可能”,亦即“经验”的“可能性”的“来源”问题,而这个“来源”不可能“在”“经验”之内,必在“经验”之外:“经验”可能的“条件”“在”“经验”之外,这个“条件”才是“绝对”的,不是“经验”的某一个“环节”;而这个“经验”的“绝对”的“可能条件”为“理性”。^③实际上,康德先验论的根底,或者说核心的观点其实就在于此。康德最艰巨的工作就是要论证这种非经验的、理性自身具有的形式本性及其经验运用的客观有效性。

①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②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作者的话:论康德》,第8页。

③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65页。

正如在理论哲学中一样，康德的道德哲学也饱受形式主义的诟病。康德的道德法则除了一般性、普遍性等形式的要素外空无内容吗？康德的学说是一种只讲动机不问后果的理论吗？他的理论和现实的经验世界有何关系？这些是对康德实践哲学的各种批评中会冒出来的问题。叶先生似乎也并没有直接去回应这些问题，但是，在他看来，“理性”为“意志”的“立法”是无关乎经验的“目的”的，因此这条“法律”也并不受“经验目的”的“限制”，而是“自由”的，不受“感性欲求”的“驱使”，当然也并不在实际上“压制—抑制”这种“欲求”，要做到所谓“清心寡欲”，只是在说“意志自由”是“悬搁”起（胡塞尔）诸种“经验欲望”，“意志”自有“规则—准则”，这条“自由—自有”的“准则”“规定”着“行为”（包括其原因和结果）的“道德”上的“品质”，“规定”着“行为者”“人格”的“品质”，即“规定”着“德性”。^①这一核心论述既标示出了康德哲学的实质性，也隐含着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实际上也回应了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康德的批评。

当代倡导美德伦理学的代表性学者麦金太尔等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颇有影响，但是，这些批评却很难说切中要害。因为被他们诟病为形式主义的先验原则恰恰是康德着力要确立与维护的。如果结合叶先生的相关论述，那么我们将会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康德道德哲学的立足点同样是理性的自主性。正如叶先生一再阐明的，意志自由即理性的自主。也就是说，意志遵循的道德法则是理性自身确立的。理性只有一个，理性在实践领域的运用即实践理性。正如感觉观念不能成为知识的规定者那样，感性欲求这些经验的东西不能成为道德法则的规定者。如果质料成分（诸如经验禀好、经验欲望或“幸福”）成为道德法则的决定根据，则理性就降格为满足这些在前的欲求的手段，理性就没有自主性，就没有自由可言。作为高级的欲求能力，理性在成为决定行动意志之根据时，它不借助任何质料与经验，而只作为形式的普遍规则去规定意志。这是理性的自由所在，也是理性保持为自由之所在，当然

也是一切道德成为道德之所在。理性这里给出的形式法则，显然绝不是像批评者以为的那样，只是形式的，不关内容的，因而是无力的，不现实的。相反，理性的形式法则恰恰是要求贯穿于一切内容、一切现实之中。实际上，康德道德哲学立论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经验主义的批评。经验主义者把自己的原则建立在人类学、心理学和自然世界的一般事实的基础上，他们的道德原则来源于经验的概括和抽象，理性和道德原则仅仅是谋求幸福的手段。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来源上的混淆和次序上的颠倒是经验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康德说：“幸福原则与德性原则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因此立即就成了两者的对立，而且纯粹理性并不希望人们应当放弃对于幸福的要求，而只是希望一旦谈到职责，人们应当完全不瞻顾幸福”。^②

实际上，在康德这里，道德法则不是与幸福毫不相干，而是关系重大。人是目的的命题不是空洞的，它首先要求现实生活中理性存在者之间交互的对权利和幸福需求的尊重。任何道德哲学，只要它是合理的，没有不考虑后果的。叶先生重视对康德“至善”的研究，也强调了康德道德哲学健全的现实感。^③对于康德来说，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最终目的，通过意志自由产生至善这是先天的，在道德上是必然的。至善是完整的善，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至善的第一条件，但德性不等于幸福，缺少了配享的幸福这种善，人还不能拥有至善。意志的决定根据只能是道德法则，但践行了道德法则的理性存在者，应该得到配享的幸福。这不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目的，而是普遍立法的理性存在者视角下无偏私的一个需求。以至善作为意志的对象，并竭尽全力促进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命令。假设至善是不可能的，命令促进至善的道德法则也必然流于幻想，从而危及道德法则本身。所以，在先验哲学的维

①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9页。

②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1页。

③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79、141页。

度上,康德还必须解决至善的可能性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康德就需要某种目的论方能达成内在的一致。

在叶先生近年的康德研究中,对《判断力批判》的研究可谓重中之重。叶先生的美学思想在当代别具一格,他重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叶先生对第三批判的诸多创见得益于对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方法的深入思考,他关注的是康德哲学的整体性问题,而不是狭义的康德美学,虽然对康德美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叶先生看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里已经孕含了他的《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主要思路,而这个第三批判所增加的(也是康德思想有所“改变”的)只是“审美判断力批判”的部分。^①这个观点对于《判断力批判》的研究颇具启示意义。

的确,前批判时期最先引起康德注意的是道德和自由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改造,康德不可能孤立地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康德才走上了理性批判的道路。理性只有一个,理性自身是统一的,但理性有其复杂的内部结构。《纯粹理性批判》在纯粹知性批判基础上,全面地审核了理性的各种能力,从而为康德的整个哲学提供了方法和理论大纲。先验分析的方法把知识解析为理性自身具有的形式(包括时空形式和知性的范畴)和来源于经验的质料,形式和质料的二元论造成了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没有这些理论的基础,康德不可能在论证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同时解决自由的可能性问题。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所谓“鸿沟”),一方面限制了理论理性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实践理性的应用清除了障碍。没有对先验自由和自然因果性在不同的关系中可以并行不悖的论证,实践自由的可能性就没有理论根据。对于自由和自然的二律背反,康德的解决之道是通过区分理性的不同运用范围,从而使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原则各安其位,互不干扰。然而,这只是说理性在两种不同的领域的“立法”可以并存,康德的任务还未完成。理性实践应用的世界和理性

理论应用的世界是同一个经验的世界,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必须在这个经验世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和理性的实践目的的实现相协调。由此,康德还需要某种目的论才能使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起来,实现理性自身的统一。

正是因为处理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纯粹理性批判》不仅为《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包含了后者的理论大纲。对于《判断力批判》,也应作如是观。也正因此,叶先生对“先验辩证论”及“范导性”的分析和解释对于第三批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②

如果作个对比,就可以发现,《判断力批判》的“序言”和“导言”,和《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附录”(纯粹理性理念的范导性应用、人类理性的自然辩证论的终极意图)有高度的相似性。在“附录”中,康德指出纯粹理性超越经验的应用是一种自然倾向,只会带来各种幻相。但是理性的理念自身并不是辩证的,而是其应用范围不当才成为辩证的。康德区分了理性的两种运用:其一为理性的无可置疑(apodiktisch)的运用,其二为理性的假设性运用,前者为建构性的运用,后者为范导性(regulativ)的运用。^③理性的假设性运用针对的是知性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其作用是范导性的,即一方面约束知性的应用范围,限制知性的僭越倾向,另一方面又以理性的理念规范、引导知性的应用。但是理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不是构成性的,它不是经验知识可能性的条件,而仅仅是出于理性的关切的一个“主观”的准则。理性的这两种运用对应着《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规定的判断力和反思判断力的区分。康德此时企图在理性能力之中分离出独立的反思判断力,然而反思判断力并无自己的立法范围,其颁布的“自然地合目的性”原则也仅仅是一种范导性的原则。在这两段文本中,康德

①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82页。

②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74~76页。

③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页。

无论处理的问题、还是处理问题的方法都是类似的。然而，要想回答两者究竟同在何处、异在何处，以及何以同、何以异的根据，就需要做一番真正的哲学研究工作。对这些至为明显的相似熟视无睹，使汉语的康德“美学”研究大打折扣。而以叶先生这些富于启发性的观点为指导，在《判断力批判》这个康德哲学研究中素来相对薄弱的领域，我们将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叶先生康德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康德的具体观点放在康德哲学的整体框架中，并给出通贯的解释。康德的一些短文向来不被研究者重视，作者却将之放在康德思想的整体中，给出了深入的解释。^①康德的第一批判的“先验方法论”常常为专家忽视，叶先生通过对它的分析来凸显康德哲学的重要特点。^②在这些研究中，作者不仅实现了文本研读和义理贯通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的问题和论证已经转化为叶先生进行哲学思考的资源。这使叶先生的康德研究不仅具有专业的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本身的意义。

重视义理的贯通是叶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精神，这在康德哲学研究中更是如此。他

不仅要分析康德各个具体的思想和康德哲学整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超出了康德哲学，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分析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和康德哲学在理路上的贯通，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种义理贯通不是要找到一个现成的线索，而是建构出一个理路来。理路不是发现的，不是先在那里等着你去接续，而是在创造性的解释中开显出来的。理路没有唯一性，但有深浅广狭的不同，有通与不通的区别。理路不是历史地把思想排列起来，理路需要学理的内在根据，需要系统的论证。这样的理路的揭示与展开同时就包含着作者自己的哲学思考。所以，叶先生的康德研究并非只是一种专业性工作，同时也是寻求理路的思想事业。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参见《小文章，大问题——读康德〈论哲学中一种新近升高的口吻〉》，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84~99页。

②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100页。

The Enterprise of Searching for the Route of Reason

—A Book Review of *Enlightenment and Freedom: Ye Xiushan on Kant*

Liang Yizhong

Abstract: The book *Enlightenment and Freedom: Ye Xiushan on Kant* collects a series of representative papers which are thirty years' outcomes of Professor Ye Xiushan by studying Kant's philosophy. He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Kant's specific ideas and his whole philosophy, and goes a step further: he tries to reveal that the other great philosophers' thoughts have a rational correlation with Kant's philosophy. In this study, Professor Ye not only unifies studying texts with clarifying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he transforms Kant's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nd explanations into his own thinking resources. So his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philosophy expresses his ow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thus his Kant study is not only a profession, but also an enterprise of searching for the route of reason.

Keywords: enlightenment and freedom; Kant; reason; judgment